

1795

乾 嘉 文 學

六十年

李景屏◎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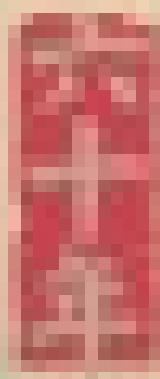


華藝出版社



卷之三

三



李景屏◎著

南
北
行
走
五
十
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乾隆六十年：1795年/李景屏著.—北京：华艺出版社，2009

ISBN 978-7-80142-796-0

I.乾… II.李… III.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24800号

乾隆六十年：1795年

作 者：李景屏

运营统筹：鲍立衡

责任编辑：刘泰 韩海涛 常永富

出版发行：华艺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229号海泰大厦10层

网 址：<http://www.huayicbs.com>

邮 编：100083

电 话：010-82885151

印 刷：北京顺义兴华印刷厂

开 本：710×1000 1/16

字 数：258千字

印 张：21.25

版 次：2009年6月第一版

印 次：2009年6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142-796-0/I · 372

定 价：32.00元

华艺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华艺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前 言

18世纪后半叶的欧美，已经被近代化的浪潮所席卷，北美独立战争、美利坚合众国建立、法国大革命对封建制度的扫荡以及在英国发生的工业革命等等，都使得世界面目焕然一新。而此时，乾隆统治下的清帝国不仅依旧滞留在封建格局之中，而且是处于最专制、最集权的时期。

乾隆在70诞辰所撰写的御制《古稀说》，颇为自得地写道：“前代所以亡国者，曰强藩、曰外患、曰权臣、曰外戚、曰女祸、曰宦寺、曰奸臣、曰佞臣，今皆无一仿佛者。”在乾隆统治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已达到历史的最高峰，清朝皇帝不仅成功地根除了造成以前朝代亡国的种种弊端——诸如以藩镇为代表的地方割据势力、威胁中央王朝的边疆割据政权、操纵朝政的权臣、专权的外戚、后妃预政、太监弄权、奸佞之臣对政局的把持，而且对传统的八旗制进行改造、打破旗主对本旗事务的垄断、使之成为受命皇帝的军事组织，并解决了亲王预政、太子结党等对君主集权构成威胁的问题，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体制的确发展到了极致。

但君权的高度集中，也导致政坛上万马齐喑，朝野上下思想僵化。在乾隆即位之初，孙嘉淦所上的“预除三习、永杜一弊”

的奏疏，就折射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君权的极度膨胀，君臣关系极不正常的现状：

“主德清，则臣心服而颂，仁政行，则民深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称盛，发一令而四海讴歌。在臣民本非献谀，然而人主之耳，则熟于此矣。耳与誉化，非誉则逆。始而匡拂者拒，继而木讷者厌，久而颂扬之不工者，亦绌矣。是谓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

“上愈智，则下愈愚，上愈能，则下愈畏。趋跄谄胁顾盼而皆然，免冠叩首应声而即是此。在臣工，以为尽礼，然而人主之目，则熟于此矣。目与媚化，非媚则触，故始而倨野者斥，继而严惮者疏，久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谓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

“敬求天下之事，见之多，而以为无足奇也，则高己而卑人。慎辨天下之务，阅之久而以为无难也，则雄才而易事质之人矣，而不闻其所短，返之已而不见其所失。于是乎意之所欲，信以为不逾，令之所发，概期于必行矣。是谓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

“三习既成，乃生一弊，何为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是也。”

上面的这番议论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

由于君主道德好，臣下由衷佩服、歌颂；又由于实行仁政，深受其恩的百姓感恩戴德。因而君主说一句话朝廷上的人都夸好，发布一项命令全国的百姓都赞扬。对于臣民来说，并非阿谀奉承，但君主的耳朵已经习惯了赞扬、歌颂的声音。君主的耳朵已经习惯听颂扬的话，听到的不是歌功颂德的话就觉得逆耳，一开始拒绝听批评意见，接下来就厌恶不会奉承的人，时间长了，对逢迎不巧妙的人，也会心生厌恶。皇帝已经习惯自以为是，喜欢别人服从，而讨厌违背自己意念的人。这就是所说的习惯了顺耳之言，就喜欢阿谀奉承而厌恶刚正不阿。

前
言

君主越聪明，就显得臣下越愚蠢；君主越能干，臣下就越畏惧。当君主放眼望去时，看到的是巧于奔走、满脸堆笑、巴结奉承的一张张媚脸，听到的是不绝于耳的颂扬之声，对于臣下来说，认为在遵守君臣之礼，但君主的眼睛已经习惯了。君主的眼睛已经习惯看到种种媚态，不献媚就是冒犯。一开始斥责傲上的人，接下来就疏远严肃正直的人，时间久了，奉承得不巧妙的人，也就成为不顺从的人。这就是所说的习惯了所看到的媚态，就喜欢柔顺而厌恶刚强。

天下的事见多了，就认为没有什么特别的，认为自己高明而看不起别人。谨慎地处理朝廷政务，时间长了也就觉得没有什么难处理的，以自己的雄才大略去要求别人，而听不到他的不足之处，审视自己也找不到失误之处。于是，在施政上随心所欲，坚信自己不会做得过分，发布的命令一概要求必须施行。这就是所说的已经习惯随心所欲，就喜欢服从而厌恶违背自己的意志。

已经形成“喜谀而恶直”、“喜柔而恶刚”、“喜从而恶违”的“三习”，就必然滋生喜欢阿谀奉承的小人而厌恶正直公正君子的弊端，施政上存在的所有问题就愈积愈多，而且被掩饰起来，一旦到了掩饰不住的地步，一切的一切也就难以扭转了。一个王朝也就不可避免地由强盛走向了衰亡。

君权高度集权所带来的另一个弊端，就是扼杀臣下以及全国读书人的独立思维、打造出充满奴性、唯唯诺诺的国民性，造成官员人格的扭曲。面对皇帝的淫威，绝大多数官员所奉行的是“少说话，多磕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因循苟且，明哲保身，打探消息，巧于奉承，正像时人所写的一首词所揭示的：

“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封，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滑，一味谦恭，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在朦胧，议也‘毋庸’，驳也‘毋庸’。‘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襄赞要和衷，好也弥缝，

歹也弥缝，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后世更无穷，不溢‘文忠’，便溢‘文恭’。”

一切都在乾隆的安排之下，一切都在乾隆的掌控之中。

而君权高度集中所产生的后果，便是异化——看似高度集权，实则已经失控。乾隆时期对秘密组织的不断取缔、对贪官污吏的一再查处，固然反映出励精图治、维持盛世的决心，但秘密组织的屡禁不止、贪污大案的屡屡发生，所揭示的也恰恰是对民变、对吏治的力不从心，反映出攥在皇帝手中官僚机器出现了严重的故障，表明封建体制已经走到了尽头。

虽然在当时的官场上有一批洁身自好的官员，如刘墉、阿桂、董诰、王杰等，但他们无法遏制官场上的贪风，也不可能把那些官仓之鼠盗出的一个个黑洞给堵上，大清帝国就像一艘千疮百孔的舰船在海上漂浮，尽管渗入的海水已经使船身下沉，大多数人却浑然不知；一些有识之士，如曹锡宝、尹壮图、洪亮吉等人发出的发聋振聩的疾呼，旋即被吞噬得无声无息……政坛上依旧是死一般的沉寂、凝固。

在乾隆去世的那一年11月，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组成了执政府，自任第一执政，对内坚决镇压反革命复辟势力，对外与“反法同盟”多次鏖兵，并以排山倒海之势扫荡着欧洲的封建势力，不仅巩固了法国大革命的成果，还把大革命的影响扩大到欧洲。而与乾隆同一年去世的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在执政期间“以最干净最节约的手法，一下子为美利坚解决了那么多难题，替未来免去了那么多隐患……”，从而为美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美国综合国力的提高等都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然而乾隆在63年的统治中，不仅未能给他的王朝免除“隐患”，就连许多明显的社会问题也都留给了皇位继承人，诸如对民间秘密组织的失察、有海无防、军备落后、鸦片走私与白银外流等等。

乾隆在1795年归政，不仅意味着康乾盛世落下了帷幕，也

前
言

意味着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体制已经走到了尽头。此后的中国，不可能在“文景”之后产生“贞观”，“永乐”之后出现“康乾”，在前朝的废墟上再也不能滋育出一个封建盛世了，在历史的长卷中康乾盛世已经成为绝唱。乾隆去世后仅仅41年——也就是1840年，鸦片战争的祸水就突然洒落在这块古老的国土上，展现了“忽啦啦似大厦倾，昏惨惨似残灯尽”的一幕，而国人所面临的千古巨变，较之明末的甲申之变还要严峻、痛苦、深刻。如果说万历十五年的年鉴是明王朝“历史上一次失败的总记录”，那么，1795年的年鉴就是中国封建社会“一次失败的总记录”。

笔者于2008年初秋



前言

海外狂飙

2	法国科学传教团
3	康熙与法国神甫
7	凡尔赛——北京轴心
8	乾隆的挚友：王致诚、蒋友仁
14	了解世界的窗口
16	法国大革命的冲击
20	中法不同的历史走向
25	挡不住的海外干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
30	撞击心灵的震撼——路易十六被处死

治理百姓

35	重本抑末
41	民为邦本
43	食为民天
47	以保赤为念
50	治理水患
59	所谓不扰民
71	免粮不免租
77	盛世下的佃农
81	严惩“刁民”

取缔秘密组织

87	漏网之鱼刘之协
90	屡禁不止的邪教
94	清水教聚众为变
99	从严查办秘密宗教
100	“八卦教”大闹大名府
102	天地会扫荡台湾
107	难缠的来华传教士

驾驭群臣（上）

——选拔宰辅

114	被处死的讷亲
119	恭顺的傅恒
126	真宰相刘统勋
131	盖棺未定论的于敏中
136	脱颖而出的阿桂
144	颇有争议的和珅

驾驭群臣（中）

——任用督抚

164	治河能臣高斌
169	两朝股肱尹继善
173	关注民生的陈宏谋
179	苦难磨炼出的方观承
182	从州县崛起的高晋
184	瑕玉并存的李侍尧
190	状元督抚毕沅
193	毁誉不一的孙士毅
198	能征善战的福康安
211	偶尔露峥嵘的和琳



驾驭群臣（下）

——监控与失控

215	高度集中的君权
222	查处山西布政使及山西学政
224	第一个被处死的总督
227	处死山东巡抚蒋洲
229	追查两省的知县贪贿案
232	两淮盐引案高恒丧命
235	大义灭亲处死内侄
241	查处甘肃冒赈案
244	赐令勒索属下的国泰自尽
251	处死盗臣陈辉祖
256	处死顶风作案的郝硕
259	查处贪贿不法的富勒浑
261	处死挪用盐课的福崧
265	督抚藩臬一勺烩
268	吏治失控

退位归政

277	披露立储	
286	公布立储密旨	
293	兑现周甲退位	
300	归政仍训政	
305	白莲教起义	319
310	乾隆去世	322
		参考书目
		后记

海外狂飙

1795年对于乾隆及其所统治的帝国都是重要的一年，执政已经满60周年的乾隆就要从皇帝的宝座退下来、去当太上皇帝……

在中国封建社会，乾隆帝无疑是一位功业显赫的皇帝。西方传教士曾如此评价乾隆及其控制的政权：“不懈地忙于日理万机，这是一个令人景仰的政府，他是天下最伟大的君主，也是帝国中最大的文豪。”能熟练地掌握几种少数民族语言、精通汉学的乾隆，不仅勤于政务，也通过对边疆的开拓奠定了中国现代疆域的版图，而他成功的民族政策与宗教政策也有效地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作为个人，乾隆并不那么传统，他喜欢西方钟表，也欣赏西方园林与绘画风格，在他主持下作为皇家园林的圆明园可以出现西式风格的建筑、喷水池，在他的身边也可以有一批擅长绘画、精于音律、有实地勘测经验的西方神甫。但作为一个皇帝，他的统治却是相当传统，竭力要把中国留在中世纪，而不是带入近代。

然而此时的世界，却已经进入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的时代，中世纪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已经成为革命的对象，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愤怒的民众所处死，都在乾隆的心中掀起无限波澜。虽然中法两国相隔

乾隆像



一万六千多里，但乾隆却与路易十六神交已久，来华的法国神父早已在他们之间建立起沟通的桥梁。

中法两国高层的交往始于1681年（康熙二十年）。与康熙帝同时期的君主——法国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四，因法国科学院派人到世界各地进行地理考察以便绘制航海地图而开始考虑如何同中国皇帝交往的问题。路易十四与康熙皇帝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冲龄即位，都凭借雄才大略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并把自己的国家推向了鼎盛、使之成为区域性的强国——一个成为欧洲大陆科技文化的中心，一个称雄亚洲。

法国科学传教团

17世纪80年代，法国为了进行地理考察已经向大西洋、地中海等地的港口派出科考人员，那时的英国、丹麦以及非洲、美洲等地都有法国科学院的人在那里进行实地勘测。唯独对派人到中国进行考察一事，令法国科学院的人感到棘手，他们对这个国家实在是知之甚少。考虑到耶稣会（天主教的一个修会）传教士自利玛窦在一个世纪前（1582年，明万历十年）来华传教以来，耶

稣会士不仅在中国的土地上立足，而且其中的一些人还直接为中国政府、中国皇帝服务，同官方一直有密切的联系，路易十四决定从法国的耶稣会士中物色来中国的人选。于是，法国科学院的地理考察，便同耶稣会的传教联系起来。

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第一个科学传教团由洪若翰、白晋、张诚、刘应、柏应理、李明等神父组成。在出发前，法国科学院负责人接见了这些传教士，1685年3月他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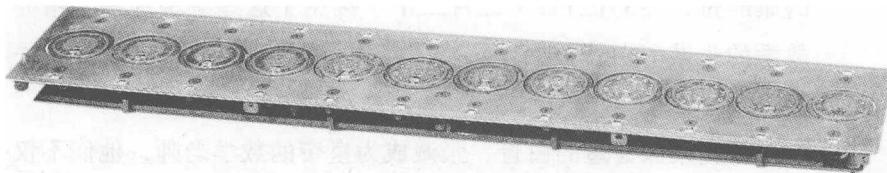


康熙洋装像

行带着国王命令授予的测量仪器从布雷斯特乘船出发，用传教士的话来说：“这些人组成一个‘中国科学院’，即巴黎科学院的分院。”^①

从1688年法国科学传教团抵达北京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的一百多年，法国政府持续向中国派遣由耶稣会士组成的“科学传教团”，继洪若翰、白晋、张诚之后，巴多明、杜德美、沙如玉、汤尚贤、德玛诺、冯秉正、宋君荣、王致诚、蒋友仁、钱德明等纷沓而至。这些法国神父肩负科学考察、传教的双重使命，既要向法国科学院汇报工作，又要向罗马教廷汇报传教事宜。

① [法]伯德莱：《清宫洋画家》，耿昇译，P189，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1月版。



法国神甫进献给康熙的“盘式手摇计算机”。1642年法国科学家巴斯加制造出“盘式手摇计算机”，可以完成加、减、乘、除的运算

在康熙中期以前，来华传教士中以葡萄牙籍人数居多，葡萄牙政府是环球航海的支持者，最先控制了从欧洲到亚洲的新航线，而且该国又深受耶稣会的影响，葡籍传教士自然多。然而到路易十四派遣法国科学传教团以后，这一情况开始改变，在来华的传教士中法国人的数量急剧增加，以至后来居上，名列前茅。据费赖之在《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记载，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来华的法国籍的神甫为86人，葡萄牙籍的为79人。

康熙与法国神甫

1687年7月23日——也就是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十六，洪若翰、白晋、张诚等一行抵达宁波，并在第二年的2月7日（康熙二十七年正月初六）奉康熙皇帝之命到达北京。正在为祖母守孝



白晋、张诚为康熙编译的《几何原本》

的康熙帝，在3月21日（二月二十）接见了这些法国神甫，精通数学的张诚和白晋被康熙留在了身边，洪若翰等3人则到外省去传教。

留在康熙身边的白晋、张诚成为皇帝的数学老师，他们不仅讲授算术、几何基础、几何学，还用满文编写了教材。除了教授数学外，他们还在清帝国的对外交往中充当翻译。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清廷派出以索额图为首的谈判团前往尼布楚，与俄国代表团就边界划界进行谈判，张诚作为翻译同行。在谈判中，由于俄国使臣负责人戈洛文执意要“据黑龙江北之地”，而使谈判陷于僵局。张诚在得到索额图的同意后，前往俄国使团驻地，劝彼等放弃对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土地要求，张诚劝俄方应该珍惜“每年都可以到北京做买卖”的巨大经济收入，而不是同中国开战、夺取新的领土。^②在张诚的斡旋下，俄方决定放弃雅克萨，接受康熙皇帝所提出的边界划分办法，使得中俄尼布楚条约得以签订。

康熙不仅令法国神甫参与重大的外交谈判，还委任他们为皇帝的特使出使外国，张诚曾奉康熙之命出使俄国，白晋则成为康熙派往法国的特使。白晋在1693年（康熙三十二年）离开北京，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抵达法国，给路易十四带去康熙的礼物，这些礼物中包括一些中国的经典和科学著作（共49卷）。到

② [法]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信简集——中国回忆录》，《耶稣会传教士洪若翰神父致国王忏悔师、本会可敬的拉雷兹神父的信》，I, 279页，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

1699年（康熙三十八年）白晋从法国返回中国时，又把“法国国王以装订华丽之版画集一册”带回，“转赠中国皇帝”。

至于洪若翰、刘应，在康熙患疟疾时因进献治疗疟疾的特效药“金鸡纳霜”（奎宁）而使康熙彻底摆脱了疾病的折磨。这些“金鸡纳霜”是在印度传教的神甫多鲁寄来的，而在当时的北京还没有人了解这种药。

这些法国神甫不仅直接为清政府、清朝皇帝服务，还以自己的科技知识在文化交流的长河中培育出康熙《皇舆全览图》这株奇葩。《皇舆全览图》是在实地勘测基础上绘制出来的，这同法国传教士的大力推动有直接关系。到中国进行地理考察，是他们来华的重要使命之一，只有同为清政府绘制全国地图联系到一起，对中国进行地理考察才会畅行无阻。

1700年（康熙三十九年）来华的法国神甫杜德美，最先向康熙皇帝提出“联合神甫数人在各处观测”以测量北京子午线的建议，但康熙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严拒不准”，“殆恐西洋人详悉中国形势”。

而最终劝说康熙皇帝进行实地勘测、绘制地图的，却是1698年（康熙三十七年）来华的法国神甫巴多明。据来华的法国神甫沙如玉在信札所披露：“康熙皇帝曾误以奉天省会沈阳与北京同一纬度，亦位于39度56分。多



巴多明墓碑